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清代全史

(第一卷)

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一本卷主编／李洵 薛虹

方志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清代全史（第一卷）

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本卷主编 李 洵 薛 虹

方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全史·第1卷 / 李洵，薛虹主编。—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4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ISBN 978 - 7 - 80238 - 025 - 7

I. 清… II. ①李… ②薛… III. 中国 - 古代史 - 清代
IV. K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1214 号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

清代全史 (第一卷)

本卷主编：李 洵 薛 虹

责任编辑：李 沛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 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大楼 12 层)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fzph.org>

发 行：方志出版社发行部

(010) 85195814 85196281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法律顾问：北京市京诚律师事务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印刷二厂

开 本：787 × 1092 1/16

印 张：20.25

字 数：337 千

版 次：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238 - 025 - 7/K · 797 全套共 10 卷 定价：560.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再 版 前 言

《清代全史》1993年7月初版，1995年2月第二次印刷时，对初版纸型进行过少量挖改。其实在1993年7月之前，1~6卷还印过一次，所以有的书在版权页上可以看到“1991年7月第一版”及“1991年7月第一次印刷”字样。

《清代全史》这次再版，按常理说，是一次推出修订版的大好时机。但在和出版社洽谈时，我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内容不作修改。这倒不是自认为没有修改必要，而是没有充裕的修改时间。与其匆匆修改，不如不改。当年同甘共苦的同事，有7位已先后离开我们，目前健在而且有精力从事笔耕的同志，手头都有繁重工作，请他们立即腾出手来修改旧作是有困难的。

《清代全史》所定的奋斗目标是，写出一部反映现阶段我国清史研究水平的学术著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争有新的突破。经过十几年的检验，现在可以说，达到了立项时所定的奋斗目标。

《清代全史》邀集了祖国大陆几十位学有专长的研究人员，其中大多数是高级研究人员。他们虽然都不是通才，但对清史中的一些领域，有长期从事专题研究的基础。分工承担《清代全史》中的相关章节，写来自然能反映那个“现阶段”我国清史研究水平。

这个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主管，由我负责具体的学术组织工作。立项最初几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拨给研究经费，从1987年起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申请资助。当时国家经济还不富裕，科研经费很少，平均每年不过两万元。我们开会，是在近代史所的招待所，不论名望高低，都是两人一间，吃饭都在近代史所食堂。各分卷主编，要承担大量的学术组织工作，除了自己应得的一份稿酬外，没有拿一分钱的主编费。所有撰

稿人除了资料费和文具费外，没有其他开销。艰难玉成了我们，也是前辈的敬业精神激励了我们，使我们能顺利地按期完成任务。

清代的历史，和以往最大的区别，是中国被突然卷入了世界潮流。一个以弯弓跃马崛起的满族建立的大清皇朝，面对着以战舰火炮先后崛起的几个大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美利坚、日本、俄罗斯。这些陌生的来客崛起后便到中国叩门，频繁使用通商、外交、传教、战争等手段，对中国巧取豪夺。用什么样的政治智慧应付这种局面，是摆在清政府面前最严峻的难题。应付这种局面的历史，就成了我们今天的研究对象。中国何以落后挨打？这是清代历史中头等重要的研究课题。中国何时开始落后于西方？清代前期几个帝王治理国家的政策有何重大失误？中国国防力量为何如此脆弱以致几千侵略军就把一个庞大帝国打得屈辱求和？早期觉醒的志士仁人图富求强的改革为什么总是陷于失败？《清代全史》就这些问题提出过自己的见解，至于更深入更细致的研究翘首以待未来的清史论著。

民族问题，是清代历史中最重要而且最复杂的问题。清代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时期，而且在这个时期最终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坚实基础。《清代全史》用了较多的篇幅，叙述中国境内各兄弟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等多方面的关系。对清政府的民族政策，正确的和错误的，成功的和失败的，都作了比较深入的探索性的叙述。

《清代全史》用了将近十分之三的篇幅叙述清代的经济，而且是由长期研究清代经济的专家们撰写的。广泛涉及清代经济的各个方面，对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尤其是区域经济、部门经济、行业经济，边疆经济开发，以及对外贸易，都有比较充实的内容。

在《清代全史》立项以前很长的历史时期，人们习惯于把清史的下限定于鸦片战争，道光中期鸦片战争以后的清代历史，则属于中国近代史。由于这个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40余年，还没有一部完整的作为断代史的清史问世。而中国近代史，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以几次重大政治事件为主体结构。《清代全史》作为一部完整的断代史奉献给读者，首先必须突破多年来形成的近代史模式。这种突破，其真正意义在于为今后编写完整的清史断代史提供了一种探索性的见解。

几十位专家学者的大协作，最明显的优点是每一位撰稿人在自己的专

业领域内有长期的积累，有较丰富的专题研究成果作为起点，为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也存在着不利的因素，最主要困难是在重大理论问题上如何消除分歧保持一致。我们在摸索中采取了一种办法，现在看来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经常召开分卷主编会议，并邀请出版社的负责人参加，讨论涉及全书的重大理论问题。通过讨论，亮明各自的观点，发现分歧所在，寻求协调一致的途径。现在看来，是一个有价值的尝试。

我们也碰到过一些虽说不大但很难办的问题。外国国名、人名、地名、书名，兄弟民族族名、人名、地名、书名，有各种不同译法，史籍中各行其是，很不一致。凡加了引号的直接引文，原则上是不改的。但对兄弟民族的蔑称所加的“彑”字偏旁，对外国国名、人名所加的“口”字偏旁，我们径直改正不加说明，这是学界惯例。但有一些译名，例如人名，哲布尊丹巴，又称哲卜尊丹巴，又称折卜尊丹巴，也称泽卜尊丹巴。再如地名，“勒通”藏语汉译为理塘，又译里塘或李塘。再如国名，现称俄罗斯，过去称鄂罗斯，或称罗刹。如果以为“罗刹”不雅（特别在佛经里）改称俄罗斯，那《平定罗刹方略》，该改成什么书名？如何全书保持一致，有惯例可循的好办，没有惯例可循的，我们只好按史籍原文照录，不去强求一致。我们遵守了这一规则，却违犯了另一规则，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在撰稿过程中，我最忧心的是学术质量问题。待到快要完稿时，我最忧心的却是出版问题。那时正是经济转型时期，学术著作出版非常困难，申请出版补贴那时还没有先例。在这个存亡关头，辽宁人民出版社慨允资助出版。现在想起来，当初如果不能出版，几十位学者辛勤工作的成果，就会变成一堆废纸，在《清代全史》再版时，饮水思源，我们要对辽宁人民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次再版，需要重新录入，进行电子排版，编辑工作，一切从新开始。但在电子排版中存在一键之差，往往错成一片的情况。工作量大，时间紧迫，方志出版社的李沛同志、徐宏同志和颜伦琴同志，为此书的再版辛勤工作了几个月，有时甚至节假日也要继续工作，我对他们的敬业精神，表示真诚的敬佩和感谢。

王戎笙

2007年3月13日

前　　言

为了促进清史研究的繁荣和发展，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便酝酿组织全国力量，编写一部大型清史，后由于“文化大革命”被迫中止。“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这项工作又提到了议事日程。但由于前辈学者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年迈体弱，这项工作便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在完成前辈未竟之业。

1983 年以前，曾设想组织全国各省市科研机关和高等院校的力量，编写一部 1000 万字左右的清史，并按这个设想拟订了规划。经过反复讨论，鉴于大量的清史资料特别是清代档案正在整理，专题研究还不够深入，修纂大型清史的条件还不具备，这个规划一时难以实现。

1983 年在长沙史学规划会议上，重新讨论了清史编纂规划。这个规划的要点是：自 1983 年起，到 1990 年，即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以 8 年的时间，完成一部十卷本的《清代全史》（当时暂名为《清代通史》）和大约 20 卷的《清代人物传稿》。

《清代全史》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资助研究经费。书中的观点，是我们探索性的学术见解。编撰人员完全是自愿结合。项目负责人邀请一些朋友，分别担任各卷主编，再由各卷主编聘请学术界同仁组成该卷的编写小组。第一卷主编李洵、薛虹，第二卷主编王戎笙，第三卷主编郭松义，第四卷主编王戎笙，第五卷主编韦庆远、叶显恩，第六卷主编喻松青、张小林，第七卷主编龙盛运，第八卷主编宓汝成，第九卷主编徐彻、董守义，第十卷主编刘克祥。

本书不设总主编，采取分卷主编负责制。这是一个尝试。目的在于充分发扬学术民主，有利于发挥撰稿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持不同学术观点

的人可以心情舒畅地一道工作。为保证本书具有较高学术水平，我们经常举行分卷主编会议，除了讨论工作中的问题外，主要是讨论重要学术问题。例如，清朝前期的历史地位，清朝面临的国际形势以及清政府应付这种新形势的能力，清政府的民族政策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边疆地区的开发，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所具有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种种特征，这些问题在分卷主编会议上都交换过意见。我们的写作过程，是互相学习、互相砥砺的过程，也是全书在重大理论上保持完整体系的过程。

我们的目标是编撰一部反映现阶段我国清史研究水平的学术专著。因此，我们力求放眼世界，注意信息，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吸取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学如积薪”，我们力争有所前进、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得到许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以及海外同行们以各种形式给予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以出版《清史研究丛书》享有盛誉的辽宁人民出版社热心地接受本书的出版，并慷慨地给予出版资助。该社的袁闻琨编审、徐彻副编审、高虹编辑，为这部书的出版尽了很大的努力。对此，我们由衷地感谢。我们学识有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望海内外的朋友不吝指教。

王戎笙

1990年7月

目 录

再版前言	(1)
前 言	(1)
绪 论	(1)
第一章 满族的先世	(9)
第一节 元末以前的女真	(9)
第二节 明朝和女真的关系	(15)
第三节 明代女真的社会和经济	(31)
第四节 女真族统一的历史趋势	(41)
第二章 女真的统一和金国的建立	(48)
第一节 努尔哈赤征服女真各部	(48)
第二节 金国的社会和政治	(66)
第三节 对明的战争和灭叶赫统一女真	(94)
第三章 金国努尔哈赤时期在辽东的统治	(115)
第一节 金国对辽东地区的军事征服	(115)
第二节 封建农奴制度的确立	(127)
第三节 金国同朝鲜和蒙古的关系	(156)
第四节 宁远之战和努尔哈赤死亡	(170)
第四章 金国在天聪时期的发展	(179)
第一节 皇太极继位后金国社会的变化与政策的调整	(179)

第二节 明金间的议和活动	(204)
第三节 明金间的战争与双方实力的消长	(223)
第四节 金、明、蒙的相互关系与金国对蒙古及黑龙江等地的控制	(241)
第五章 入关前夕清朝势力的形成	(252)
第一节 清帝国的形成及其“汉化”过程的加强	(252)
第二节 入关前夕清国的社会状况	(270)
第三节 朝鲜成为清国的属国	(282)
第四节 明清间进入决战	(286)
第五节 皇太极之死与全国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	(296)
后 记	(306)

绪 论

公元 17 世纪初，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原明朝建州左卫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诸部，于 1616 年自称金国汗，不久其势力就进入辽东地区。经过 26 年的明、清双方在辽东地区的争逐之后，于公元 1644 年乘李自成农民军推翻明朝的时机，进入山海关内。其后又用了将近 20 年的时间征服了全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

公元 1644 年，清朝势力从沈阳将其政府迁至北京，皇太极的幼子福临在摄政王多尔袞的监护下，登上大清皇帝宝座。一般在习惯上把这一年作为朝代史上清朝的开端，直至公元 1911 年辛亥革命，清朝灭亡，共历 267 年的历史，称为清代史，而清朝入关前的历史，常常被称作“清朝前史”。所谓“清朝前史”，亦即清朝势力的兴起史，这段历史对于整个清代史来讲是十分重要的。本卷所涉及的就是“清朝前史”，它可以告诉人们，清朝势力是怎样形成的，其组成的成分是什么？它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结构又是怎样？它为什么可以由小变大，由弱转强的本身机制和环境机遇是什么？尤其重要的是它的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等政策和制度，是如何影响着入关后清朝的历史，也可以说如何影响着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进程。

一 清朝兴起时期的中国及其周边形势

清朝兴起时期，正当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这个时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在发生某些变化，社会由于公元 15 世纪中叶后出现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流民运动而呈现动荡。大批流民在全国各地游荡，影响着封建秩序的稳定。16 世纪、17 世纪后，全国城乡，不断发生农民、流民、城市居民的暴动，全国处于持续的动乱之中。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一些经

济发达地区，如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私人海外贸易都有着显著的发展，在上述地区的个别地方个别生产部门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种“萌芽”当时还十分微弱，但是在其发生地区，却刺激着生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某些生产部门、生产结构的改组，自由雇佣劳动者和劳动力市场出现。随着白银货币化，国内商业市场呈现繁荣。隆庆时期开放海禁后，海上私人贸易有所发展。但中国广大的北部、西部地区的经济不发达，生产萎缩，灾荒频仍，与江南及东南沿海地区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就全国来讲，封建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实行对全国城乡的大规模掠夺，使一些经济繁荣地区的经济遭到破坏，发展遭到阻滞。

16世纪后期，贵族大地主势力居于统治地位，在经济上对全国各阶层人民进行野蛮掠夺，在政治上排斥其他的政治势力，刚刚发展起来的江南经济及其政治势力，遭到破坏与打击。党争迭起，政局混乱。贵族腐败，官僚腐化，民怨沸腾，动乱之势已成。

随着明朝对全国统治力量的日益衰退，内地的大规模人民起义，一触即发，边疆民族地区的民族动乱，日见频繁。17世纪初期，东北地区努尔哈赤势力崛起，攻入辽东，西南地区四川奢崇明、贵州安邦产势力攻陷遵义、毕节、重庆等地。努尔哈赤已建号金国，奢崇明建号梁国。奢、安起兵，遭明军镇压，而努尔哈赤势力则取得萨尔浒战役对明的全胜。几年后，一场17世纪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在陕北地区爆发。此后，中国全境陷入严重的动乱之中。

当清朝势力兴起于中国东北部时，中国周边的形势是：东面的日本国，正值“关白”丰田秀吉统一全国之际。日本出兵朝鲜，企图灭亡朝鲜、侵略中国。明朝出兵，与朝鲜军民合力，打退日军。战争期间，辽东成为后方基地，战后明军复员安置不当，地方遭到扰害。不久朝廷又派来辽东税监高淮，对辽东军民，大肆搜刮，几度激起军民反抗。辽东地区呈现动乱，建州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崛起，攻取抚顺、清河，势力深入辽河以东地区。

北面黑龙江流域和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出现了沙俄的侵略。从公元1581年开始，沙俄势力开始向东扩张，万历初年其势力越过乌拉尔山，末年已席卷西伯利亚，渗透到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崇祯初年其势力进至乌第河流域，建立了雅库次克城。在清朝势力入关前夕，沙俄入侵者翻过了外兴安岭，到达精奇里江的上源，野蛮蹂躏达斡尔人居住地，抢夺烧杀，无恶不作。清朝的貂皮贸易资源，遭到侵掠。但此时正值明清间争夺辽东的战事

紧要关头，双方都无暇顾及沙俄势力的侵略。

在南方沿海地区，此时西方殖民势力（主要是葡萄牙与荷兰）正在开始以武力敲击中国的南方大门，并蚕食中国在东南亚海上的贸易权利。当时明朝虽已衰微，但仍有力量抗拒从海上来的侵扰，与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的情况，完全不同。

以上就是清朝兴起时期的历史的、地理的基本环境。明末社会的危机与动荡，削弱了明朝政府对全国的控制，使新兴起的满族势力，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中国周边的形势，虽然外国殖民势力从北、南两个方面逼近，但当时的中国还存在防御的力量，对中国国内和东北地区，还没有构成影响，不会影响到明、清间的战争历程。

二 从建州女真到金（清）在辽东确立统治期间社会结构的变化

明初以来的女真社会仍是民族组织，满语称为穆昆哈拉。哈拉是其原来的氏族，穆昆是从哈拉分出来的、徙居别地的宗支，由宗支建立的子氏族曰穆昆哈拉。其主要职能是组织采集狩猎生产和产品分配、抢掠和防御、管理婚姻和祭祀。

穆昆哈拉的“细胞”是家庭。家庭既是父权家长制的血缘小集体，又是经济单位，有生产工具、武器、生活用品等私有财产。几个家庭的劳动组成塔坦，从事采集狩猎，塔坦长负责安排野外食宿和指挥生产。适应较大规模狩猎的需要，由若干个塔坦组成牛录，由牛录额真指挥统一行动。牛录塔坦是女真氏族社会的生产组织，起初是临时性的，逐渐成为固定性的。

氏族间由于联姻、控制和依附而结成部落。部落的主要职能是对外掠夺和防御。斡朵里部和胡里改部的联合结成建州女真，是明代女真中最先进的部落。

女真社会中基本的社会关系是氏族成员间“无君臣上下之分”、“不得役使”、“不相为奴”。女真各部由于靠近汉族和朝鲜族的农业区，尤其是建州女真经常掠俘汉人和朝鲜人为家内奴隶，驱使其耕作。这种农业生产依附于女真人的家庭，不直接受牛录塔坦管理。女真人的家庭要适应采集狩猎和战争的需要而时常迁徙，奴隶耕作也要随之迁徙，不断地舍弃熟田开垦新地。女真人普遍役使外族奴隶，其社会内部存在着女真人奴隶主和汉人、朝鲜人奴隶的阶级对立。从这一点来说，女真人的氏族社会是个阶级社会。

明朝在女真氏族部落设置羁縻卫所，委派其首领为卫所官员，颁发印

信敕书，使其修贡，并发展朝贡贸易和马市贸易。其各部首领既是氏族的统治者，又是明朝地方政府的官员，还是女真商团的首领。这种羁縻关系加速着女真氏族社会性质的演变，促进氏族内部、氏族部落之间的分化。

女真氏族部落之间本来就有大小、富贫、强弱之分。由于处于“野蛮”阶段，抢掠是氏族部落聚积财富的经常的手段，而敕书是主要财富，凭敕书“擅参貂之利”。嘉靖中叶以后，女真各部间抢夺敕书和参貂的战争越演越烈。“强凌弱，众暴寡，争为雄长”，先后涌现出许多强部豪酋。明季各部女真间的战争，就是女真统一的历史过程。

在不断战争和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女真氏族社会内部权力和财富日益分化。随着首领的战争指挥权力的扩大，其役使的奴隶和占聚的财产也不断地增多，其社会地位也渐渐地似乎很自然地凌驾于氏族社会之上。战争的经常化，促使牛录塔坦组织成为经常的军事组织。

16世纪80年代努尔哈赤崛起，在军事征服的过程中，为适应战争规模扩大的需要，在牛录之上组建高一级的军事组织——固山（旗）。到17世纪初确立了固山牛录制度，即八旗制度。“出猎行师”是八旗的主要职能，一切社会生活均按八旗制度来组织进行。八旗制度逐步地取代穆昆哈拉制度，成为女真社会的军事的、生产的、国家体制的组织，但是女真社会中仍然保持着穆昆哈拉组织，管理婚配和祭祀，敦宗睦族，承担着维护血缘关系的作用。

八旗制度下社会关系的主要变化，是破坏了原来女真人之间的氏族成员平等关系。努尔哈赤的氏族成为社会的最高统治集团，努尔哈赤的子侄成为八旗的主旗贝勒和不主旗贝勒。一般的女真人被强制地编入旗下，成为依附于贝勒的隶民，曰诸申。诸申有自己的生产工具、武器、牲畜、奴隶和其他私有财产。诸申对贝勒负担兵役、劳役和贡赋。这是阶级对立的关系。这种人身不完全依附的阶级关系是八旗制度下女真人之间基本的、普遍的社会关系。在诸申的基础上，金国汗和诸贝勒之下，由努尔哈赤的亲信、功臣、勋戚以及归附各部女真的首领，组成等级森严的集团。他们是各主旗贝勒的臣属，又是八旗各级组织的统辖者和领有者。

随着战争的发展，战俘被分到各旗贝勒、大臣和诸申户为奴。奴隶的队伍也在迅速膨胀。被俘的女真人也大批沦为奴隶，并且有的分给归附金国的蒙古王公，改变了女真人之间“不相为奴”的旧俗。但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对立不是八旗制度下女真社会主导的社会关系。

早在16世纪建州女真生活在辽东山地的时期，已经出现了“拖克索”

(农庄)，由汉人和朝鲜人在庄头的监督下耕作。拖克索不随同庄主迁徙，耕作者有部分的私有财产，对庄主承担着苛刻的贡赋和繁重的劳役。这是接近奴隶的农奴劳动。八旗的牛录屯田也采取拖克索的制度，屯田耕作的女真人也是农奴式的劳动。

到 17 世纪 20 年代，努尔哈赤的金国进入辽东地区建立统治。女真人迁来分区驻防，圈占原住汉人的土地作为旗地分给八旗官兵。同时，对广大的汉人，“计丁授田”，将汉人皆编入旗下，负担着繁苛的兵役、劳役和贡赋。这样就将女真人和汉人全都组织到八旗制度中，束缚在“份地”上，承担着各种封建义务。天命六年的“计丁授田”成为金国在辽东地区强制地确立封建农奴制度的标志。天命十年的大屠杀后，对存活下来的汉人“编庄”，是进一步的农奴化。

皇太极即位后，实行满汉分居，将一部分编庄的汉人农奴，解放“编户”。虽然减轻一些民族压迫，但是并未改变金（清）统治下辽东基本的社会制度是封建农奴制。

从女真族或满族的社会发展来说，这个过程，无疑是社会向前发展，但对辽东地区原来在军屯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封建租佃制度来说，又是一次历史的倒退。

三 从建州女真族到满族共同体再到清朝势力的发展过程

建州女真族、满族、清朝势力三者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又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三者在“清朝前史”中，是既有联系又互有差别的三个历史时期连续发展的产物。

建州女真族是指明朝所建立的建州三卫的女真居民，是东北地区女真族许多部落中的一支部落。这个女真族部落通过不断移徙，逐渐接近辽东地区，受到农业生产发达、社会先进地区的影响较多，内部的农业生产比较发达，但狩猎经济也较发达，“擅参貂之利”。通过马市贸易，使这个部落与内地的经济、文化关系较为密切。建州女真部落的本族人口并不多，民族的成分也比较单纯，本族的男子绝大部分从事狩猎、战争与掠夺。农业生产主要是依靠掠获的外族劳动力来进行。

16 世纪 80 ~ 90 年代，在建州女真族中出现了武力强大的努尔哈赤势力，进行对建州女真族分散的各部族武力统一。努尔哈赤以此为基础，开始把兼并战争推向建州女真族以外的海西和东海等女真族。此时已形成一个大女真

势力，不再是建州女真了。公元 1616 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金国汗，1618 年吞并叶赫，表明这一历史过程的完结，下一个历史进程的开始。

在金国的八旗组织中，除主体女真人外，有相当多的蒙古人和汉人。这两种民族成分，在金国势力进入辽东地区之后，急速增长，尤以汉族人口增加最多。皇太极时期为了战争的需要，同时也为了调整八旗内部的民族关系，在八旗组织中，分出蒙古八旗与八旗汉军。在汉人中间也分出旗与民两种身份，八旗汉军是八旗旗人，而更多的汉族人则被编为民户。

天命、天聪年间，有大批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等处的民族，被编入八旗，称为“新满洲”（伊彻满洲）。这就使八旗的民族成分，更加扩大。在八旗这样一个社会共同体中生活。

16 世纪末，出现了一种利用蒙古字母书写的新女真文，即“无圈点满文”，习惯上称为“老满文”。以后逐渐改进，到皇太极时期，形成“有圈点的满文”，习惯上称为“新满文”。这样女真族获得一种统一的、规范的民族文字，对于形成共同文化、共同心理，起了巨大的作用。

皇太极于天聪九年（1635 年）宣布废除“诸申”（女真）旧称，而以“满洲”来作新的族称，标志着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的最终形成。

自从 17 世纪 20 年代中期皇太极继承汗位之后，他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加快了吸收比较先进的政治体制，以明朝的政治体制为模式，改造了自身的政治体制，推动了本身的封建制的发展。同时也积极调整政策，以争取汉官和明朝在辽东的势力，形成一个以满洲族为核心的政治联合体，壮大了力量。天聪十年（1636 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标志着这个政治联合体已经形成。这是一支完全有力量与内地其他政治势力逐鹿中原、夺取全国统治权的强大政治势力。至此这个政治势力不再是满族势力，当然更不是建州女真族势力，而是包括东北地区的各种政治力量。我们把它称作“清朝势力”是最为恰当的。

“清朝势力”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在东北地区兴起的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的民族势力，随着历史的推移，从开始的建州女真单纯的民族势力，逐渐聚集女真各部落力量而壮大起来，吸收了各民族的成分，蓄积了更大的力量，而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后来又进一步把在东北地区的政治力量，尤其是辽东的汉族力量，凝聚起来，从而组合成一支强大到可以与内地其他政治势力抗衡的“清朝势力”。这一历史性发展进程，对于“清朝势力”入关并征服全国、建立新的封建王朝，十分重要。

四 入关前的清朝和入关后的清朝之间的历史关联

顺治元年（1644年）是清朝历史关键的一年，因为它把清朝的历史分为入关前和入关后两个阶段。入关前，皇太极已宣布国号大清，并即皇帝位。死后其子福临，于崇德八年（1643年）在沈阳继皇帝位。第二年为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关。这年的十月，福临移至北京，又举行了即皇帝位的大礼。福临的第二次即皇帝位，标志原来割据一隅的清朝势力，已经成为君临全国的清王朝。这个变化对清朝势力来讲是巨大的。入关前后的“两个清朝”历史地位虽已变化，但两者之间，却存在着很多内在的关联，影响着清朝的历史。

清朝入关前的社会经济形态有着不少特点。这些特点是由满族本身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民族经济构造、经济政策等诸因素形成的。而清朝入关后的一个时期所实行的经济政策与措施，无不与此特点有关。

清朝势力在关外时，在辽东等地区，就实行过一种旗地制度。这种“旗地”是八旗原有的拖克索（农庄）形式的庄园经济结构，旗地基本上属于农奴性质的生产形式。入关之后，大批八旗兵丁、满族族人随同进关，为了维持这批人的生计与粮饷，实行了比较大规模的圈地，圈占了大批汉族的土地，同时把在关外管理旗地的办法，也同时移植到这些新圈占的土地上，也可以说把一些农奴制的管理应用到发达的封建租佃制的土地上来。清朝这种圈地和追捕逃人的办法，不是入关后才有的，而是在入关前在辽东地区，早已实行过的办法。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都曾在辽东实行移徙汉民，圈占土地，开设旗庄。也曾有过严厉的惩治逃人（农奴）的法律。入关之后，不过是这一切的又一次重复。所谓圈地指包括土地上的劳动者一起圈占的意思，土地成为旗庄，劳动者沦为农奴。凡八旗圈占的土地，属于官地，其所有权属于国家，不准买卖。而被圈占的土地，大多是汉族人的私有土地，这些土地上的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大多是自耕农民和租佃农民，圈占之后，土地占有关系和人身地位都起了本质的变化。这种情况直到17世纪80年代，才逐渐停止。其后在旗地内实行租佃制，再后，则旗地被旗人抵债卖出现象也开始出现。这样使由于圈地而引起的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倒退的现象和落后的生产关系因素，才被清除，而旗地则仍然以一种外表的形式，存在下去，但其内部生产关系，基本上与民地无大差别。

在政治制度方面，清朝入关前，经过皇太极时期的几次改革，已经基